

冰点特稿第854期

8月的一个周末,下午两点,中国交响乐团老年活动中心的门准时打开。其他同事七手八脚地开始摆麻将桌,82岁的章雪萍则径直走向了北墙的白色展架。上面印着12个鲜红的大字:《岁月当歌》——中央乐团老照片展。

前三张照片要突出的,分别是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。

“这应该是我们乐团排演《东方红》大歌谣的时候,毛主席和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一起接见我们。”满头白发的章雪萍指着第二张照片说。正是当年分管文教的书记刘少奇在1952年指示,“以中国青年文工团为基础,建立国家歌舞团”,才有了后来分离出来的中央乐团。

除了和同事冯婉珍、王廷英一块儿发起这次图片展,从2007年起,每个月下旬,同样是在这个活动室里,章雪萍还有另一个身份——乐团离退休老人“谈心会”主持人。如今,谈心会已经举行了42次。前来参加的,包括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夫人李珏、继王昆之后扮演白毛女的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于等老人。当然,每次也少不了冯婉珍,她从1979年开始受乐团领导之命,撰写有关中央乐团的宣传报道,至今仍偶尔能在报刊上见到她对乐团的回忆文字。

这些老人提到“乐团”两个字时,一般指“中央乐团”。这个1956年成立的乐团,在1996年进行改革后,更名为“中国交响乐团”。不过,章雪萍和冯婉珍等老人的记忆,更多地停留在1996年之前。

那是与音乐有关的五味杂陈的近半世纪时光。

为革命服务

对于章雪萍来说,这段时光开启得更早,在1948年。

那一年,她从湖南周南女中毕业。与母校的前辈学长蔡物、杨开慧、丁玲等人或投身革命或投身文学不同,不懂什么是声乐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钢琴的章雪萍,选择了进入湖南音专学习。

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是男高音歌唱家胡然。他有一个明确要求:“学生只许搞业务,不许搞政治。”

一个地下党同学私下找到章雪萍:“我介绍你入一个党,这个党你只知道我,我也只知道你,别的人都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党啊?”
“共产党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什么党不党,我爸爸不让人党。”如今在北京和平里的家里,章雪萍回忆,自己当年就这样拒绝了同学。

尽管如此,长沙解放时,尚未毕业的章雪萍还是跟部队走了,在四野138师宣传队为《白毛女》一剧伴唱。有人动员她参军,但她由于拉提琴的男朋友不想参军而作罢。

辗转回到1951年底,章雪萍通过了主考官孟于主持的考试,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歌队。孟于早在在洗里海的鼓励下,考入鲁艺,1945年起便在张家口饰演《白毛女》中的喜儿和《血泪仇》中的王桂花。

1952年,歌队变成中央歌舞团合唱队。除了革命歌曲外,演唱刚刚创作出来的新歌,也成为孟于、章雪萍等队员的任务。其中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至今仍被广泛传唱。

两年后,大学毕业生冯婉珍考进合唱队。她参加演唱的第一首歌是《我们的祖国》,创作者是曾写出《社会主义好》的李焕之。当年秋天,22岁的冯婉珍便“非常激动”地跟随合唱队到怀仁堂,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演出,并第一次见到了台下坐着的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。

“我们作为专业乐团,唱了很多革命歌曲。解放以后很多商店里播放的《打得好》、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等,基本上是我们乐团到电台录的音。”冯婉珍回忆说。

她至今自豪的是,乐团创作组里,有后来创作出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的施光南,创作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的郑律成,创作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的瞿希贤等“懂音乐”的作曲家。因此,当年的合歌曲,虽然不少是歌颂党和领袖的,但都是用艺术手法写的。

“当时唱西方的歌,一定要有级别很高的领导批准。”她强调。所以,上世纪50年代,他们能唱的大都是苏联、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歌曲。

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。1953年,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要举行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。最终章雪萍所在的合唱队夺得一等奖,19岁的钢琴家傅聪获得三等奖。

那次获奖让章雪萍和同事们刻骨铭心,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在这一年经历的大悲大喜。

当年3月,章雪萍正在王府井买东西,广播里突然传来沉重而悲痛的声音,斯大林逝世了。

“我当时就觉得不行了,咱们阵营的领袖没有了。”她回忆说。回家后,她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。但这一次,组织没有批准,理由是她“骄傲自满、个人英雄主义、不联系群众”。

不过,随后传来的消息,一扫章雪萍内心的阴霾。为了更好地为世界青年联欢节做准备,组织决定先派他们到苏联进行一个多月的培训。

出国前,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良好形象,担任驻外大使的耿飏被请来给代表团讲课。“他告诉我们西餐怎么吃,哪个手拿刀子哪个手拿叉子。”章雪萍边说边比划着。

不仅如此,代表团还专门为女团员购置了镂空高跟鞋。她们被告知,罗马尼亚人在罗马尼亚期间,女性一定要穿丝袜和凉鞋,一定要把脚露出来,以便宣告中国女性不再是小脚女人。

这样做的必要性很快得到证实。“真的,我们一上街走路,就有人看我们。人家还真就看我们的脚。”章雪萍说。

她最受人瞩目的时光,也始于那年年底,合唱队以贺龙为团长的赴朝慰问团为志愿军演出。

正在为《荷花舞》和《采茶舞》伴唱的章雪萍,突然被从台下叫到幕后,“报幕员嗓子哑了,你赶快报幕去。”领导急匆匆吩咐道。

接下来,现场的人们听到:“下一个节目,女声独唱《南花花》,演唱者郭南英。”随后,郭兰英走上了台。

穿着合唱服的章雪萍刚回到幕后,领导劈头便问:“你刚才说的什么?”

“《南花花》啊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!”

“《南花花》。”

这时,这个分不清发音的湖南女人才意识到,自己把“兰”说成了“南”。

即便如此,领导还是发现她“报幕的时候很自然”。这也让章雪萍从此走上了报幕主持的道路。

同事们则开始笑称章雪萍为“幕后合唱队员”——幕后排练时有她,上台演出时,她却穿着合唱服跑到台前报幕了。

当然,这些往事在展出的照片里都看不到。因为在1956年7月10日,中央乐团才以原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和合唱队为基础而成立。

为国家演出

前几年,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回顾1959年中国首次排演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》的往事时,曾采访章雪萍。

主持人朱军一上来便问:“听说您还是我们的前辈?”

章雪萍明白他指的是报幕主持这事儿,便淡淡地回应:“算是吧。”她只是没有眼前这个后辈幸运,在她风华正茂的年纪,报幕员在中国还不是一个专职职位。

1955年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晚会,招待正式访华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,那时章雪萍便是报幕员。报完幕后,她需要回到自己在合唱队的位置,和冯婉珍等一起用越南语为客人演唱《胡志明之歌》。

1959年,中国和东德同时建国10周年。为了与中国一起庆祝,东德决定国庆期间派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到北京演出,主打曲

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。极左思潮不肃清,文艺就不能发展。”

在冯婉珍日记中,当时,《纽约时报》和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记者、日本文化界代表、荷兰电影导演、法国导演和作家等访问团接踵而来。

“不仅是左派,中间派要来,右派也要来一点,这就需要我们适应新的形势。”在基辛格来访前夕,周恩来总理提出,要允许文艺工作者进行尝试。

一年后,西德外长来京商讨两国建交之事,周恩想来为其演出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。他安排秘书给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打电话,得到的答复是,乐团在“文革”后早已不敢练习西方音乐,很多人也已下放干校,几天内难以演出。

为时代伤痛 之一

这并非乐团第一次遭遇专业之外的困难。早在1961年年底,李德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老师阿诺索夫访问中央乐团,并指挥了4场音乐会。周恩来和陈毅到天桥剧场看了第二场演出。虽然演出效果在外人看来挺“圆满”,但过程并不顺利。

阿诺索夫指挥乐队和合唱队轮流排练时,一再发现铜管声部吹不上去。一旁等着排练的冯婉珍注意到,他大发脾气,重重地踱地表示不满。“这都是你们苏联找我们还债闹的,你看我们商店里卖的什么,只有肥皂和毛巾,哪有什么食品可吃呢?”李德伦当时毫不客气地向老师这样解释。老指挥也谅解了这些“困难时期吃不饱,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”的乐师。

当时,团长李凌千方百计地弄回来一些鸭子,20个人才能分一只。乐师和演员们在北京演出一场,每个人的报酬经常是两个花卷。

而章雪萍除了自家的演出,还经常被外单位“借”去报幕。一度,总政歌舞团想调她去。“我们这儿唱的歌要比他们唱的歌好,什么都合,他们总唱一些革命歌曲,都是《大渡河》那种叮叮咚咚叮叮的。我不能离开这儿。”章雪萍当时这样想,于是拒绝

干了。”结果,这句话成为“煽动群众罢工”的右派罪状。

这样的事,在章雪萍、冯婉珍等人的记忆里,不胜枚举。他们至今仍深深感激中央乐团时任团长李凌。

这位团长当时吩咐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合唱队队员,继续巡演,千万不要返回北京参加鸣放。

“如果当时我们回北京,至少一半的人会被打成右派。”李凌后来曾这样回忆。乐队在外地演出了三个多月,返回北京时,反右已过最高峰。主要力量得以保留,也让乐团在1958年首次为电影配乐录音成为可能。他们先后为《上甘岭》、《英雄虎胆》、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、《狼牙山五壮士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雷锋》等电影担任配乐。

也是在这一年,“音协”提出,“展开对黄色音乐的批判”。为响应这一要求,乐团派人到北京各大高校讲课,告诉师生们哪些歌曲是“黄色歌曲”。“周璇的《何日君再来》”被批得最多。还有电影明星李丽华的《歌》。冯婉珍回忆。

为时代伤痛 之二

1963年,全国兴起抛弃洋乐器改奏民族乐器的风潮。音乐家贺绿汀生前回忆,南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被拆散,乐师改行,有人被分配到剧院当售货员。还有音乐学院取消了外国乐器专业,让学生改学二胡。

音乐和舞蹈的“革命化、民族化、群众化”,也在全国掀起大讨论。为了证明交响乐也能“三化”,中央乐团举办普及音乐会,把当时全国传唱的革命歌曲以乐队形式连续演奏,名为《革命歌曲联奏》。合唱队把《白毛女》中的一些片段改为大合唱,乐队则把《白毛女》的音乐改编为组曲。“想方设法把民间音乐素材,改编为西洋乐器演奏。”冯婉珍说。

除此之外,乐师们在演奏时必须面带表情,以加强音乐的描述。在演奏《白毛女》中的“杨白劳”一段时,他们要面带哀愁。每排一段之前,指挥李德伦须带领乐队先学一段毛主席著作,以体现活学活用。

往事并不如歌

本报记者 王波



交响乐《沙家浜》演出照

了。

今年年初的谈心会上,章雪萍问眼前的老同事们:“咱们都是搞音乐的,可真正在这儿搞了几天音乐?”

“没搞几天音乐,全是运动。一个接一个,一个接一个。真的没有搞什么专业。”她自己随即答道。

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。

刚到北京不久,她便赶上公私合营“打老虎”。她带着被子到琉璃厂画店的“资本家”家里住了一个多月。蹲守店里,把最好的画挑出来上缴国家,不让店主卖。由于不懂得,她专门挑那些漂亮的和颜色好看的,结果专家一鉴定,全是赝品。

“那些老板白天放鞭炮欢迎公私合营,晚上在家里就哭。你想,把他的财产给拿走了,他愿意啊?当然不愿意。”章雪萍撇着嘴回忆说。

她和同事们的专业提升,也一次次被类似的运动打断。“每个运动都得参加,参加了,就没时间搞业务了。”她说。

“世界上没有一个职业乐团的人,从政治上到艺术上,有我们这样的遭遇。我们国家政治运动比较多,每一次政治运动,我们几乎都要放下业务,投入到运动中。反右,大家要去参加各种批斗会、鸣放会,谁也不许唱歌,不许动业务了。肃反,我们也要参加,我们身边也有人被认为是反革命的。大炼钢铁我们也要参加,五七干校,我们去种苹果、种桃子、种水稻。”冯婉珍滔滔不绝地说。

2001年出版的《李德伦传》中提及,有人问乐团管务员资料的马润源:“共产党党内恐怕也有矛盾吧?”马随口答:“当然也得有了。”仅仅因为这句话,他就戴上了右派帽子。

来自哈尔滨的小提琴手宋文秋,一句“苏联到东北时抢东西,强奸妇女”便成为“反右右派言论”。“不管管乐手白哲敏的大字报贴出来没有,没什么反应,在吃早饭时随口戏言:‘如果下星期还没有答复,我就不

在不好看,影响了音乐艺术一方面,反而破坏了新四军的形象。”冯婉珍说,乐团随后演出改穿中山服。

“当时很多人很羡慕样板团。但样板团是生活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的,说错一句话,就可能把一个人或一部戏打倒打死。他们会体不到心里的那种恐惧啊。”冯婉珍强调。

这种风浪,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日和2日,中央乐团在民族宫礼堂演出《为毛主席词两首谱曲》、《东方红》等曲目。这是乐团最后一次以样板团身份演出,冯婉珍注意到,同事们都非常高兴。

尽管无力为西德外长演奏贝多芬《欢乐颂》,中央乐团在1972年依旧是国家用音乐接待外宾的不二之选。

毛泽东在这二年也认识到,“光有这八个样板戏不行”。“看来文艺的事我得管一管了。”建军节前夕,他在书房接见年轻的京剧演员李炳淑时说。

在此之前,中央乐团已经开始做了一些新的尝试。这年5月,他们开始公开试演《国际歌》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等革命歌曲。

当时,林彪事件发生不久,《红旗》杂志罕见地刊登了两首歌的歌词歌谱,要求全国人民一起唱,以团结和统一认识。《人民日报》等报纸也发表评论员文章,呼吁“唱好两首革命歌曲”。

乐团还组织人员创作了《梅花三弄钢琴协奏曲》,但被“枪毙”,因为里面有“西方资产阶级颓废的印象派和声”。

但这并不影响乐团开始跟“资产阶级”接触。1974年10月,由87人组成的“中国中央乐团”出访日本,这是中央乐团首次外访。后来有人告诉冯婉珍,访问期间管得很严,并且每个人发放的现金有限,只好买了几根铅笔做纪念。返回北京后,日本驻华大使馆先邀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饭,随后他们坐车到了人民大会堂。在一个厅里休息时,门突然开了,进来的是邓小平。

这个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领导人,和江青、叶剑英等一起接见乐团人员。

这次出访,也让中央乐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没再演出。因为要“消毒”——全体出访人员一起总结访日经验,检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见所闻。如,在日本见到了乞丐,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。

而那些年,出国访问也确实极为郑重的事情。1975年,中央乐团有30多人参与演出的访美中国艺术团,临时取消原定行程,改为出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、圭亚那及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。出访前,艺术团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做了表演,最终审查通过。

在他们出访期间,冯婉珍则随其他同事一起南下福建和广东演出。

为了迎接样板团,福建省委、政、军领导亲自到福州站月台上迎接,在广州则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亲自出面接待。乐团所到的街道上,挂起“热烈欢迎中央乐团来我省演出”的巨幅大红标语,出行时前面有4辆警用摩托车开道。这也是冯婉珍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。

这次演出最引人瞩目的,是加入中央乐团才一年的女高音李谷一。她演唱的湖南花鼓戏移植革命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选段《远走高飞难找寻》极受欢迎。盛中国演奏的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选曲《军民一家亲》、刘诗昆演奏的《战台风》,也赢得全场掌声。

为时代伤痛 之三

“我们乐团当年除了到人民大会堂、怀仁堂、北京音乐厅这样的地方演出,也到人民公社、钢铁厂、大寨、大庆油田这样的地方,为工农兵演出。”章雪萍指着一张山坡上密密麻麻坐满人的照片说。

当然,从1970年起,因为身在干校,这些演出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。1976年1月,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,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掉入了深渊。

“总理去世了,我们该怎么办?江青肯定不会给我们平反的。”如今回忆起当年的处境,老人眼圈发红,甚至有些哽咽。

当时在乐团,像她一样悲伤和绝望的大有人在。他们都知道,周恩来是中央乐团成立背后最重要的支持者。

得知噩耗后,中央乐团要求停止在民族宫礼堂的演出,但于会泳等文化部领导强令在悼念期间照常演出《交响音乐沙家浜》等样板戏——“一定要演出,这是一个战斗,就是剩下一个观众也要演出。”

《李德伦传》中记述,演出那天,不少团员拉着李德伦一边哭一边表示不愿意演。李德伦考虑了一下说,这么办,咱们换个节目,唱《国际歌》、《东方红》。

4月5日那晚,从民族文化宫回来的邓宗安告诉因病在家的冯婉珍:“天安门那一片的气氛不一般,风声不对。他看到了公安、民兵拿着木棍、盾牌等从午门往外跑。这便是后来的‘四五事件’。”

一个多月后,为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,中央乐团推出《党中央决议传四方》和《首

都工人民兵进行曲》等歌曲,从5月23日起,连续四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大型集会上演出。

乐团成员内心里还留着对总理的哀思,在舞台上却要表演欢快的歌曲。率团来访的日本著名作曲家伊玖磨敏感地察觉到了乐团成员的“某种不满和矛盾”,还特别留意到“指挥家李德伦似乎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所不满”。

看到他这番话,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决定到北京看看。1976年12月,他访问中央乐团,“四人帮”已被粉碎,所以李德伦在接待他期间,才可以以中央乐团负责人身份到八宝山革命公墓,出席了“被党内一条埋藏已久的极‘左’路线不断排挤死去”的郑律成的追悼会。

同样可以开始被公开怀念的,还有贝多芬。次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,李德伦在年初便请示文化部领导贺敬之,可否举办纪念贝多芬音乐会。贺敬之请示文化部部长华山,层层向上请示。根据惯例,24日演出消息就应见报,但一直到23日晚上9点多,中央乐团才接到电话,说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,可以演出。

音乐会做了实况广播,个别单位突然听到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时,大为紧张,以为收到了“敌台”。

他们不知道,早在1972年秋天筹备西哈努克亲王50岁寿辰音乐会期间,周恩来就主动要求李德伦讲解贝多芬首首交响曲及其精神,之后还要文字材料,并特别说明要直接送到国务院。

为了接待伦敦和维也纳团体的来访,中央乐团也破例开始演奏《田园交响曲》。实际上,1973年2月,基辛格作为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访京时,先听完中央乐团演奏的《田园交响曲》后,才前往中南海与毛泽东会面。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,这位美国人士“有时不敢肯定所演的是什么”,他感受到了“文革”破坏性的干扰,觉得《田园交响曲》并非中国音乐家们所擅长。

冯婉珍回忆,尽管直到10年后的1983年,中央乐团才第一次录制贝多芬交响乐全集,但在几年前,他们已经最直接地感受到了形势的变化。1977年6月,为了出访朝鲜,乐团开始排练一套全新曲目,包括乐团成员王酪基于电影《海霞》创作的《海霞组曲》,而当年为《海霞》配乐的正是王酪。更重要的是,在1968年被江青“枪毙”的大号,在《海霞组曲》中正式复出。

这之前,殷诚忠也改回他原来的名字“殷承宗”。

一切似乎正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。1978年12月17日,中央乐团举行了这一年度的谢幕演出。除了演奏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作品,开场乐曲是当时在中国尚备受争议的法国印象派作曲大师德彪西的《牧神午后》序曲。更重要的是,这是中央乐团演出介绍曲目时,首次只介绍日本本身,而完全不再附加政治或阶级性的描述。

巧合的是,在这次演出前的12月15日,中美正式宣布建交;在演出后的第二天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中国正式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。

1999年,李德伦在深圳演出时,香港音乐学者周光葵在后台找到他,说想写一本中央乐团的历史。李德伦就跟他说了几句话:“我们乐团的这40年,是战斗的40年哦。”

为历史负责

如今,这场“战斗”早已结束,那些当年曾“一起战斗”或“相互战斗”的人,都已是垂垂老者。他们的儿女大都在国外。在章雪萍的主持下,老人们定期到离退休活动中心围着麻将桌“谈心”。

他们中年龄最小的78岁,年龄最大的孟于已经92岁。今年3月的谈心会前,孟于告诉李德伦夫人李珏:“杜锦玉不行了。”杜是他们的同事。

两天前,他们89岁的同事王卿生走了。而去年夏天同事谈炯明的离去,更是让这些老人心中有余悸。

“78岁的老头子一个人在家,抽油烟机一直转着。过去了好几天都没有人知道,有臭味儿了才发现。”有人描述说。

来谈心的一些老人,除了觉得孤单外,还担心自己“将来的命运可能跟谈炯明一样”。

这些一度离政治人物很近的人,一直很关心时政,偶尔也会反思自己的音乐人生。

“退休以后,我对我们从事了一辈子的音乐重新有了认识。我们都是搞音乐的,但是在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,并没有搞音乐,成天都是开会,不是生活检讨会,就是你批我批你。”章雪萍说。

“政治形势对我们乐团影响很大。我们毕竟不是搞政治工作的,上面的领导让我们唱什么,我们就唱什么。我们的节目,特别是到人民大会堂的节目,都是要经过审查的,要开一个节目单先报上去。在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,家庭出身不好的人,有时候是不让演出的。”冯婉珍说。

这些老人们知道,要把自己经历的历史讲清楚,并不容易。

文化部曾经让冯婉珍写一些有关中央乐团和李德伦的文章。“我说我不写,太难了。”冯婉珍说。但她又清楚,他们这一茬人,“每一年都要走四五个,死得差不多了”。

所以,得知周光葵要写中央乐团的历史时,为乐团写了30多年宣传报道的冯婉珍拿出所有资料供他无偿使用。

“没有历史,人就像浮萍一样。所以,我才给他资料,给你讲一些往事。”老人说。她和章雪萍、王廷英一起,发起的这次展览,得到了老同事们的大力支持,一共拿出了500多张各自珍藏的有历史意义的照片,最终有212张贴上了展板。

在那些黑白或略微褪色的彩色照片里,可以看到郭兰英、李谷一、李德伦、傅聪、胡松华、刘淑芳、杨洪基、鲍蕙荞、刘诗昆等人风华正茂时的模样。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和人生,也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知之不多的历史。